

国际军控

理论与实践

刘卿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国际军控：理论与实践

刘 卿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军控:理论与实践/刘卿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8

ISBN 978-7-5012-4313-6

I. ①国… II. ①刘… III. ①军备控制—世界 IV. ①D81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58595 号

- | | |
|------|---|
| 书 名 | 国际军控：理论与实践
Guoji Junkong: Lilun yu Shijian |
| 作 者 | 刘 卿 |
| 责任编辑 | 柏 英 |
| 责任出版 | 刘 喆 |
| 出版发行 | 世界知识出版社 |
| 地址邮编 |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100010) |
| 投稿信箱 | guojiwenti@yahoo.com.cn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照排印刷 | 北京景山教育印刷厂 |
| 开本印张 | 720×1020 毫米 1/16 18 印张 |
| 字 数 | 250 千字 |
| 版次印次 | 2012 年 8 月第一版 2012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5012-4313-6 |
| 定 价 | 32.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国际军控是一门外交艺术	(21)
第一节 国际军控是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23)
第二节 国际军控的制约因素	(31)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国际军控的指南	(39)
第二章 国际军控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49)
第一节 国际军控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51)
第二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国际军控的特征	(64)
第三节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军控的特征	(68)
第四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军控的特征	(77)
第五节 冷战后国际军控的特征	(90)
第三章 国际军控打上意识形态烙印	(129)
第一节 裁军谈判是资本主义国家体面扩军的手段	(131)
第二节 社会主义国家奉行独立自主与和平的裁军政策	(147)
第三节 中国是国际裁军进程中一支重要的和平力量	(157)

第四章 国际军控具有国家利益性	(169)
第一节 超级大国通过军控牺牲他国的安全利益	(171)
第二节 军控是西方国家控制第三世界的工具	(182)
第三节 西方国家以军控为名遏制中国的发展	(191)
第五章 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军控形势与应对	(203)
第一节 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军控形势	(205)
第二节 中国参与国际军控谈判的目标	(216)
第三节 中国参与国际军控进程的策略	(218)
附 录	(231)
附录 1 主要国际军控组织一览表	(233)
附录 2 近期主要国际军控会议一览表	(239)
附录 3 主要国际军控条约一览表	(240)
附录 4 中国加入的主要军控条约一览表	(246)
附录 5 中俄联合工作文件：防止在外空部署武器、对外空物体 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国际法律文书要点（草案）	(248)
附录 6 中俄等四国向第 66 届联大提交的工作文件： 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	(252)
附录 7 国际军控主要研究机构一览表	(255)
附录 8 主要国际军控刊物一览表	(259)
附录 9 美国对台湾地区军售清单一览表	(260)
参考文献	(265)
后 记	(279)

前 言

军备控制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和平时期国际政治和军事斗争的重要表现形式。帝国主义时期,西方国家曾经利用军备控制谈判释放和平的烟幕,大肆扩张军备,加速了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美国和苏联利用军控谈判作为谋求全球霸权的手段,几乎把人类带到核战争的边缘。冷战结束后,国际军控斗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呈现许多鲜明的特征,对世界政治格局转换和军事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当今重大的全球问题之一,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如何应对国际军控新形势,争取有利的国家安全环境,成为中国的重大战略课题。

研究军备控制不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对军备在军队和战争中的作用做了大量论述,其中包含通过限制军备限制战争活动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制度的角度论证了资本主义不可能实现真正裁军。列宁认为废除武装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在国家消亡之前,如果不顾资本主义妄图颠覆社会主义的事实谈废除武装,有害于国家安全,但是,为了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壮大社会主义,必须同资本主义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裁军谈判。邓小平继承了马列主义裁军思想,以裁减中国的军队来敦促美国和苏联的军控谈判,促进世界和平。与此同时,邓小平把裁军作为精兵强军的契机,增强社会主义国家在军控谈判中的地位。冷战结束后,在世界多极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军控形势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优秀品质。我们只有不断研究新情况、探索新问题,认清军控斗争的实质,才能做到在坚持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

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军备控制理论形成较早。西方国家对军备控制的研究主要是在两个层面进行的:一个是政府决策,另一个是学术理论。

西方政府一贯重视军备控制的研究。冷战时期,美国政府曾设立

军备控制和裁军署,专门负责裁军政策研究;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国防部和美国能源部等,都专门设立了军控问题研究机构;美国国防部曾设了一个负责反扩散与核安全的助理国防部长职位,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研究军备控制有关问题、提出应对方案。法国三军参谋部下设军控研究局,它根据外交部的要求和三军参谋长的指示,配合外交谈判,参与军控政策的研究与制定;总理办公厅设有军控顾问,国防部分秘书厅的战略事务办公室在协助总理处理军控事务中也起到了一定作用。英国外交部设立了军控与裁军研究所;国防部情报局负责搜集和研究外国军控与裁军情报,研究裁军建议,为国防军备控制署处理军控事宜提供情报服务。俄罗斯外交部设有裁军局,负责外交部系统军控政策的研究和业务指导;国防部设有国际条约局,负责组织总参有关单位根据军方领导意图开展军控问题的研究,提出可供选择的谈判预案。

美国等西方学者对军备控制的研究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20世纪20—30年代,以英国的弗朗西斯·布雷德利、伯纳特·博赞克特和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为代表的理想主义学派,探讨了私人军火工业、军备竞赛及其后果等问题,提出了势力平衡、和平转型等观点,“他们相信,曾经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种旧的国际体系能够转变成一个更加和平与公正的世界秩序;他们相信,在民主制度的共识下面,‘国际主义立场’的加强,国联的演进,人们良好的和平努力或者由他们传授所启蒙的思想,这一切都有助于新旧体系之间的交替”。^① 威尔逊的《论国家》是理想主义学派的代表作,他主张国际关系“实现道德理想”,“使国家和世界民主化”。^② 1918年,威尔逊提出重建世界秩序的“十四点计划”,主张裁军非战、

^① Hedley Bull,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19 — 1969”, James Derian ed., *International Theory, Critical Investigations*. New York Press, 1995, p. 185.

^② 梁守德、洪银娴:《国际政治学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第28页。

公开外交、集体安全、自由和平等,要求建立国际联盟以专门处理裁军事务、缔结国际和平条约,从而使美国与英国和法国平起平坐,并遏制日本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的霸主,美国学者为美国政府扩张军备制造理论工具,其主要标志是以汉斯·摩根索的权力政治为核心的现实主义理论的产生。权力政治理论盛行于 20 世纪 50 年代,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欲借核武器垄断地位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发动进攻的现实反映。摩根索在其代表作《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中强调:“国际政治像一切政治一样,是追求权力的斗争。无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权力总是直接的目的。”^①其具体表现为,保持权力——维持国际社会权力分配的现状,增加权力——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显示权力——追求国家的威信与声誉。国家利益由权力界定,同时与实力相对称。“扩展国家利益应表现为攫取权力,而最重要的是夺取军事优势”。权力政治论为美国扩张军备提供了理论基础。

20 世纪 50 年代末,一些美国学者意识到,在美国权力政治刺激下,苏联军备尤其是核军备发展紧追而上,如果让核军备竞赛加速发展下去,美国将会变得越来越不安全,爆发毁灭人类文明的战争的可能性将会变得越来越大。在此背景下,1960 年 6 月中旬至 9 月中旬,在“20 世纪基金会”的赞助下,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在麻省理工学院举办了一个夏季研讨会。来自美国各大学与研究所的 50 多位著名政治学家、物理学家和经济学家进行了三个月的研讨,并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于 1961 年先后出版了一系列介绍美国军控理论的著作,如托马斯·谢林与莫顿·霍尔珀林的《战略与军备控制》、《军备控制、裁

①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徐昕、郝望、李保平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年,第 35 页。

军与国家安全》等。^①

20世纪60—70年代,以亨利·基辛格为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学者基本上继承了摩根索的政治现实主义,同时修正并发展了政治现实主义的若干重要原则。他们主张用自由主义的理想观取代过于露骨的实力论、强权论,降低与苏联军备竞赛的激烈程度。基辛格提出“形成一个新的平衡”、“新的世界均势”等概念,^②这些概念成为影响70年代美苏限制核武器扩散和核裁军的基础理论之一。以卡尔·多伊奇、莫尔·卡普兰等为代表的科学行为主义学派注意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汲取方法论的教训和启示,注意定量研究(统计分析、数学分析、微机处理)、策略研究(博弈分析、决策分析)和整体研究(范畴分析、内容分析、模式分析)等在军控中的运用,强调可操作性、可重复性、可检验性、精确性和系统性,使军控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提高。^③ 博弈论是研究美国和苏联军控斗争的一个重要工具,“囚徒困境”是“博弈论”中的一个典型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冷战时期美苏军备竞赛的不可避免性。这种理论的最大不足是缺乏对谋求霸权的本质认识,因而无法解释冷战后美国为什么要继续扩军备战。

20世纪70年代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以美国的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罗伯特·吉尔平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学派对军控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现实主义认为,当前世界处于“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国际政治中除冲突和对抗外还存在着沟通、协调与合作,主张国际社会进行“多渠道联系”。他们认为,通过合作和结盟的方式实现美国的霸权利益是最佳的选择,在军控领域美国和苏联有共同利益,必须寻求合作。就核军控来说,“核武器的存在使双方行为得到克

① 托马斯·谢林与莫顿·霍尔珀林出版了美国第一部军备控制专著,因而被誉为美国军控理论创始人。

② [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陈瑞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90、96页。

③ [美]莫尔·卡普兰:《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薄智跃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

制,如果一个或另一个超级大国的根本利益被危及,并且事件发展到失控的状态,真正的考验就来到了”。^① 新现实主义军控理论对推进美苏 20 世纪 70—80 年代的核军控进程发生了积极影响。

西方对军备控制的研究产生了“核威慑理论”、“核冬天理论”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核威慑理论。^②

所谓核威慑,就是使对手相信,通过蓄意发动战争所取得的利益最终抵不上战争的代价,从而不敢发动战争特别是核战争。核威慑理论建立在冲突各方趋向于理性行为、并按代价比收益的原则行事这一假设的基础上。核大国把载有核弹头的导弹对准对方的城市或军事基地,双方互为人质,任何一方不敢首先发动战争。温斯顿·丘吉尔把这种战略态势称之为“恐怖平衡”,认为核时代的美国和苏联就像两只装在瓶子里的蝎子,如果一方进行攻击,另一方仍会有足够的力量进行反击,结果是两只蝎子都死掉。因此,他认为和平来自双方的恐惧。他说,更重要的是这种来自恐惧的和平却会有悖于常理地相对稳定,原因仅仅是双方都明白后果是什么,所以在采取行动时异常小心谨慎。^③

二战结束后初期,美国学术界和军界就核威胁战略展开了热烈的讨论。1946 年,伯纳德·布罗迪主编的《绝对武器:原子弹与世界秩序》一书勾画了核威胁理论的雏形。他在书中提出,原子弹的大规模报复能力使军事斗争中传统的得失评估过时,原子战争中将没有输家和赢家,军事力量的任务因此而发生根本的变化;原子对抗中相对的数量优势没有决定性意义,只要双方都有毁灭对方的能力,就会出现相互威慑的局面,较小的原子武库也能发挥等效威慑的作用;核报复

① Gilpin, 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26.

② 刘华秋:《军备控制与裁军手册》,国防工业出版社,2000 年,第 113 页;夏立平:《亚太地区军备控制与安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16 页。

③ [美]罗杰·希尔斯曼、劳拉·高克伦、帕特里夏·A. 韦茨曼:《防务与外交决策中的政治》,曹大鹏译,商务印书馆,2000 年,第 444 页。

利用的是对原子报复的恐惧感,只要造成的损失足够大,在对方的战略判断中造成高代价评估,即使兑现威胁的可能性不是很高,利用不确定性也可以让威慑奏效,等等。^① 这些观点逐渐成为美国政府和五角大楼威慑战略的理论基础。

核威慑理论第一次以完整的战略理论形式出现是在1954年,其标志是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大规模报复战略,宣称美国从此将保留“用我们选择的任何手段,在我们选择的任何地区”对外国侵略即刻实行报复的自由。有效核威慑的基础在于威慑的可信性。这牵涉到物质和技术因素,也涉及精神和心理因素。也就是说,既要有实力(核武库的规模、水平和生存能力)和使用实力的决心,也要让对手明确无误地了解这两点。威慑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实力和使用实力的决心,而且取决于对手的感性认识和评估。

亨利·基辛格1957年出版的《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进一步发展了核威慑理论,指出了核时代最基本的战略问题——“如何在威慑政策和该政策失败时的实战战略之间建立一种关系,战略理论的目的是把每一行动方针的有利之点结合起来,但同时却要冒最小限度的危险”。^② 他认为:“威慑需要兼具以下因素:有实力,有使用实力的意志和使潜在侵犯者估计到这两点。威慑是上述因素的乘积,而不是它们的总和。如果有一种因素不存在,威慑就不起作用。”要使威慑有效,就不能实行严格保密,必须视情况将有关核能力的一定信息传递给敌对方。但传递的信息又不能太多,否则会削弱威慑力。

1964年,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提出了“确保摧毁”的理论,主张侧重打击苏联的城市目标,即在进行第二次打击时摧毁对方的大多数城市,以威慑对方,迫使对方不敢对美国发动核突袭。60年代后

^① Bonarld Bloody ed. *The Absolute Weap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6.

^② [美]亨利·基辛格:《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北京编译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第68页;袁正领、周杰:《从核战争到有限战争:基辛格〈核武器与对外政策〉浅说》,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

期,随着美国和苏联相互威慑格局的形成,在“确保摧毁”的基础上发展了新的战略概念,如“相互确保摧毁”和“相互确保生存”。“相互确保摧毁”与其说是一种战略,不如说是一种被确认了的现实。根据“相互确保摧毁”理论,美国核军控的重点应该是减少促使任何一方首先发动第一次核打击的因素,确保双方进行核报复的“第二次打击力量”,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同意将进攻性战略武器数量“向上平衡”。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提出“战略防御计划”,并主张用“确保生存”理论代替“相互确保摧毁”理论。此后,“确保生存”理论发展为“相互确保生存”理论。

从那时至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的核军备发展和控制理论发生转折性的变化,主张在核武器数量上“向下平衡”,同时直到冷战结束时不允许苏联达到限制美国发展战略防御系统的目的。

小布什上台后,在核威胁理论中出现了“进攻性力量与防御性力量相结合的威慑”概念。小布什提出:“我们需要制定既依靠进攻性力量又依靠防御性力量的新的威慑概念”,“威慑不能只依靠报复性的核威胁。防御能够通过减少扩散的因素来加强威慑力量。”小布什想以此作为美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理论基础。为了麻痹俄罗斯,他表示“这一新的构想必须鼓励进一步削减核武器”。^①

小布什推行的扩展威慑是典型的进攻性核威慑。它采取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将核武器的作用从保护本土扩展到保护盟国,从遏制核进攻扩展到遏制生物和化学武器以及常规武器的进攻,从而大大增加了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是一种危险的核威慑战略。

在苏联军控理论中,火箭核战略理论是最为重要的理论之一。该理论盛行于赫鲁晓夫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是索科洛夫斯基。火箭核战略理论基本思想是:(1)未来战争必然是火箭核大战。战争一开始,就

^① 2001年5月1日美国总统乔治·W. 布什在美国国防大学的演讲。

会用火箭深入打击敌国的腹地、首都、大工业中心、行政中心和战略要地等。战争的结局取决于核武器的功效。(2)用战略核武器实施毁灭性的核突击,战争开始后马上就能达到主要的政治目的和战略目标。苏联拥的核力量足以把一国或几国从地球上消灭。(3)一个国家的防御能力取决于火力,首先取决于火箭核力量,而不是武装人员的数量,因此苏联的武装力量必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转变到核火箭武器方面。(4)苏联的火箭优于美国,要把这种优势保持下去直到达成裁军协议。(5)战略火箭部队、防空部队和反导弹部队将在战争中起主导作用。^①

苏联于1960年初建立了战略火箭军。苏联把核火箭称作国防威力的基础和完成火箭核战争的基本战略手段,能挫败敌军的核突然袭击,对敌人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

当时苏联集中力量发展核武器,贬低常规军备的作用,认为常规武器不是要被削减,而是要被代替。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不再把火箭核战争作为唯一的战争形式,认为未来的战争既可能是核战争,也可能是常规战争。勃列日涅夫称,苏联在对核武器给予特别注意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常规军备仍起着巨大的作用。苏联要准备打各类战争,侧重点仍在核战争,并要赢得这场战争。索科洛夫斯基在1968年出版的《军事战略》和1973年出版的《科学技术进步与军事上的革命》中,仍然强调以核条件下的作战为重点。70年代后期,苏联对核战争和核武器作用的想法发生了重要变化,认为在未来的核战争中谁也不能取得胜利,不能指望核突击能捞到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好处。为此,苏联提高了常规战争与常规军备的地位和作用。

相对来说,中国学术界对军备控制的研究起步较晚,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萌芽时期。从中国国家图书

^① 刘华秋:《军备控制与裁军手册》,国防工业出版社,2000年,第115页。

馆检索的文献来看,大部分学术著作的主要内容是如何发展中国武器装备、改变中国军备落后的面貌,仅有潘际垵的《谈裁军》(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胡今的《国际裁军问题讲话》(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7年)和人民出版社编辑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为争取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而斗争》(人民出版社,1963年)以裁军为主题,关于裁军问题的探讨大多散见于《人民日报》、《外国军事学术》等刊物上。由于受到军控和裁军实践的限制,许多阐述停留在军备竞赛和军控过程的描述,很少涉及军备控制的机理。从译介资料来看,只有四本涉及军控问题,即亨利·基辛格的《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和《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景》(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格拉斯顿·S.编写的《核武器效应》(国防工业出版社,1965年),联合国秘书处政治和安全理事会事务部裁军事务处编写的《联合国与裁军》(商务印书馆,1972年)。

其次是从改革开放到90年代初的探索时期。80年代中期后,美国和苏联的关系逐步由紧张转向缓和,由对抗转向对话,双方都将包括经济、科技、军事等内容在内的综合国力竞争作为新的战略重点。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需要通过裁军谈判达成一定的妥协,以增加双方战略关系的稳定性、减少超饱和的核武器数量,并减轻军备竞赛造成的过于沉重的经济负担。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历史时期的中国,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国内发展的任务需要,逐步调整和充实了包括军备控制在内的外交政策,恢复了军控和裁军在中国外交中应有的重要地位。中国重新审查了过去从不参加的若干多边裁军谈判条约,选择性地参加了部分条约。在这种政策背景下,中国学者翻译了大量相关著作,如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的《论核战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约翰·纽豪斯的《核时代的战争与和平》(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劳伦斯·弗里德曼的《核战略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联合国裁军事务部编写的《常规裁军研究报

告》(联合国研究报告第 12 号,1985 年),联合国裁军事务部编写的《海军军备竞赛》(联合国研究报告第 10 号,1986 年)。这一时期国内关于军备控制的著作凤毛麟角,如冯之丹的《警惕啊,人们:二十世纪裁军谈判史话》(三联书店,1979 年),北京国际战略问题学会编写的《世界军备与裁军简明手册》(军事译文出版社,1986 年),袁厚春的《百万大裁军》(花城出版社,1987 年),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主编的《国际裁军斗争与中国》(时事出版社,1987 年),刘海山和李玫的《裁军与国际法》(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年)。更多相关的学术探讨在《国际问题研究》、《现代国际关系》、《中国军事科学》等杂志上展开。

最后是从 90 年代至今的大发展时期。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缓和与新技术革命突飞猛进,世界军事形势发生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重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军备控制政策进行了若干调整,以适应冷战结束后的新形势。在此阶段,中国提出了新的安全观念,认为冷战时期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增加军备为手段的安全体制已被证明不能营造和平,扩大军事集团、加强军事同盟也无助于保障安全。中国主张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放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通过对话与合作处理国与国之间的纷争。中国强调,在冷战后时期应防止把裁军目标引向发展中国家、剥夺这些国家正当的自卫权利和手段;应防止少数国家凭借其先进军事科技和经济实力谋求绝对安全和军事优势。在新形势下,中国学者翻译了一批关于军备控制的著作。例如,联合国裁军事务部编写的《亚太地区的裁军与安全问题》(联合国专题论文集 1992 年第 11 期),亨利·基辛格的《国家战略问题》(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 年),T. V. 保罗的《不使用核武器传统研究》(军事译文出版社,2009 年),《SIPRI 年鉴》(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国内主要著作有:黎弘主编的《2011:国际军备控制与裁军》(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 年),朱明权的《核扩散:危险与防止》(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5 年)和《国际